

财经

杂志丛书

Memory
Of Reform

改革 忆事

胡德平 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戴煌 「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

于光远 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吴象 从两个「不许」到「伟大创造」

杜润生 五个「二号文件」出台始末

江平 立法「民告官」

王波明 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周瑞金 「皇甫平」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

项怀诚 从分税制到公共财政

保育钧 卡在「玻璃门」外的「非公企业」

于光远 杜润生 等著

人民出版社

财经

杂志丛书

Memory
Of Reform

于光远 杜润生 等著

改革 忆事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郑海燕

责任编辑:杨哲宇 郑海燕

装帧设计:周文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忆事/于光远 杜润生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01-007608-9

I. 改… II. 于… III. 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9281 号

改革忆事

GAIGE YISHI

于光远 杜润生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296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01-007608-9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总 序

◎吴敬琏/文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之年。

中国人历来有由当代人将当时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以便以史为鉴的传统。我们身处伟大的时代，更应当对我们的成功与失误、进步与挫折加以记录和分析，以便总结过往经验，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把改革开放的事情办得更好。

然而，在旧时代中，修史的权力基本上被官家所垄断，以致对历史事件的记述被简约阉割为帝王的“起居注”，以此为基础修成的“正史”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帝王家谱”。其间，为了统治者的利益而增删修饰，更使历史丢失了它的真面目。在新时代里，这种做法不应当再重复了。

改革开放是大众的事业，亿万工农群众、专业人员、企业家、政治家参与了这一事业。将他们的辉煌业绩和失败挫折记录下来的最合适的笔者，莫过于现代社会中的“无冕之王”——新闻记者。新闻写作所要求的翔实准确，使新闻分析成为这种活历史记述的最佳文体。可以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财经》杂志丛书——这套由《财经》杂志以不同内容选辑而成的书，便是如此这般地使昨天的新闻成为了今天的历史。不过，它是一部未完成的历史，因为改革还在继续，每一天都上演着激动人心的大戏，我们的财经媒体也源源不断地取得鲜活的素材。

2008年4月18日，是《财经》杂志创刊10周年纪念日。自1998年4月创刊至今，《财经》杂志已出版200余期。10年来，《财

《财经》始终秉承“独立、独家、独到”的编辑理念，以新闻的权威性、公正性、专业性的视角，以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的身份，持续关注、报道影响中国及世界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焦点人物，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新闻媒体。

《财经》走过的10年，是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风雨10年，也是开始全面融入国际竞争的挑战10年。《财经》在探索新兴独立新闻媒体的发展之路上，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同成长。10年来，在中国改革最重要的时刻，《财经》都有比较完整的报道和切实的记录；在改革中一些有争议、有困惑、有风险的重要事件上，《财经》以新闻人的敏锐目光，率先进行报道，推动了事件的转折和改革的进步；《财经》在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具有高专业标准的报道。

10年来，《财经》杂志在我国的专业人员乃至一般民众中逐渐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不仅是因为它用自己如椽之笔向经济中的黑暗行为投去一支支投枪，而且是因为《财经》杂志集合了一批有抱负、有才华、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人。他（她）们在迷雾重重、往往受到权力扭曲的市场上，凭着赤诚的心，用单薄的肩扛起了他（她）们本来难以扛起的重担。

在市场经济中，报纸、杂志也是商品，但又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承载着诸多社会责任、人文关怀的特殊商品。因此，如何协调业者的近期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长远看，越趋近于社会利益而避免急功近利，越能获得市场利益。因为社会的利益就是读者的利益，保证了社会的利益也就保证了读者的利益，而读者又是媒体的最终消费者。然而，经济现象往往扑朔迷离，普通投资者不一定能够凭直觉识别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所在，这就使虚假的“报道”和似是而非的“理论”能够行于一时，也必定会有一些人禁不住短期利益的诱惑而背弃良知、贻害社会以致自毁长城。所以要办好媒体就必须秉持一心为读者的理想，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见，通过自由表达对于

社会的观察和分析来服务社会。媒体的操持者，还应当有对于新闻事业的感情和敬畏，以及对于无冕之王这一桂冠的持久珍惜。

《财经》杂志丛书是《财经》杂志的增值产品，此前，《财经》杂志丛书已出版《引爆1998》（1999年出版）、《黑幕与陷阱》（2003年出版）、《管制的黄昏》（2003年出版）、《转型中国》（2003年出版）、《SARS调查》（2004年出版）等书目，均选自《财经》以往的一些经典报道与评论，但在汇编时，又不是简单的内容集合，而是通过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现实的关联性，重新规划选题，并根据相关事件和人物的最新进展，予以内容的增补和完善，使其既忠于原有的历史记录，又有与时俱进的强烈的现实感。由于这样的立意和安排，其中有些报道虽已时过多年，但读来仍不觉乏味，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而此次印行的《财经》杂志丛书新书，包括《企业变形灰幕》、《中国大买家》、《危机中国》、《权殇》、《“三农”变局》、《谁葬送了华尔街》、《起伏的繁荣》、《改革忆事》，它们既是以往《财经》杂志丛书的延续，也是《财经》创刊十年来对相关报道的一次全新的汇集。相信会像以往几本丛书一样，同样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对于《财经》杂志丛书所辑录的文章所记述的事实是否有差错，它们所表达的观点是否全都正确，人们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做出自己的评论。但其中的许多文章，闪现出了上面讲到的那些新闻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光芒，而且往往妙笔生花、引人入胜，因此《财经》杂志丛书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它对热点问题的犀利剖析促进了净化中国市场环境的努力，而且对于提升中国传媒界的职业探索和专业素养也是极具重要意义的。我十分乐意为之作序，并希望《财经》杂志丛书今后越出越多，越出越好。

改革 30 年：还原真实情境

自 1978 年到 2008 年，改革开放 30 周年纪念，可称今年国人之“必修课”。《财经》杂志不敢懈怠，亦自有追求。我们就这一主题进行征文并推出专栏，试图借回忆与反思还原历史情境，进而将以往 30 年的改革开放嵌入以往百余年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历史之内，以求得更深入的思考，并澄清未来 30 年至 50 年的中国社会变迁的可能路径。

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由衷希望读者和作者们不再拘泥于以往束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将一切事件按照“左”和“右”的简单两分法归类。因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孰左孰右，孰激进孰保守，孰正确路线孰错误路线，在不同的视角下均有相对性。对人类社会整体而言，更重要的是那些不论以何种方式呈现给大众的重要问题；而恰是那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决定着历史的方向和大众的命运。

那么，该怎么感受到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那些问题？如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 Whitehead）曾言：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

我们知道，每个人对于重要性的感受，依赖于他的智识与人品。而且，凡是重要的，通常必须是具体的；那些多次让我们免于灭顶之灾的，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当然，我们的立场绝不是相对主义的，相对于特定的历史情境而言，绝对地可以区分“正确”与“错误”。

正因为如此，基于回忆的历史经验非常重要，回忆之于今天的人

们至关重要。在心理学的意义上，人的理智总是倾向于用概念去取代真实体验，而且人的身体总有追求舒适的倾向，从而疏于对真实状况的调查。故此，正如怀特海反复告诫的那样，我们常常陷入“错置实境”的谬误。如果某一真实情境逐渐地不再能够被生动地回忆起来，后人则有可能停留于概念，错置实境。而错置的结果就是“致命自负”的理性狂妄（哈耶克语）。因此，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就成为我们对付理性自负的永远不会过时的药方。《财经》“改革忆事”栏目将以此原则行事。

借用马克思的语言，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另一种表述，叫做“从一般上升到具体”。我们习惯于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却疏于从“一般”上升到“具体”。可是，如果一般不能被上升到具体，它就仍是苍白的，关于它所适用的真实情境可以引发许多不同的想像，其中不乏错置实境的谬误。事实上，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其实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

“改革忆事”征文活动，正是珍惜历史赐予的难得契机，力图还原真实情境，梳理那些对中国社会变迁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请各项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钩沉史实，目的只有一个，为当代人和后代人留下尽可能避免“错置实境”谬误的具体、生动的档案。

现《财经》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合作，将“改革忆事”栏目大部分文章结集付梓，相信将为未来的史家留下一份真实的、足资援引的记录。

编者

2008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总序	/ 001
改革 30 年：还原真实情境	/ 001

国 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杨继绳 / 003
粉碎“四人帮”与历史转折	韩 钢 / 009
追忆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	吴明瑜 / 016
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胡德平 / 023
“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 057
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于光远 / 064
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起草始末	叶向真 / 078
邓小平为资本家“摘帽”	阎阳生 / 088
从两个“不许”到“伟大创造”	吴 象 / 095
五个“一号文件”出台始末	杜润生 / 101
为中央农研室“打工”	吴 镒 / 108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拨乱反正	薛小和 / 114
制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顾昂然 / 123
首钢承包试验	林 凌 / 136
价格“双轨制”改革的由来	徐景安 / 144
对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	赵人伟 / 150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秘密·····	王小鲁 / 173
“马丁事件”始末·····	李禹兴 / 187
立法“民告官”·····	江 平 / 200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杨继绳 / 207
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王波明 / 221
“皇甫平”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	周瑞金 / 230
从分税制到公共财政·····	项怀诚 / 246
刑法风风雨雨修改路·····	陈光中 / 253
卡在“玻璃门”外的“非公 36 条”·····	保育钧 / 263
何时能开一代民主新风·····	钟沛璋 / 270
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张木生 / 275
舆论监督的风雨苍黄·····	范以锦 / 281

家 事

小平恩泽未敢忘·····	丁运时 / 291
生产队长·“卢员外”·会长·董事长 ····· 卢国欣口述 卢怀谦整理 / 294	
一只呢绒袜·····	戴自弦 / 302
耕地·扬场·····	王守兵 / 305
告别代人写信的日子·····	陈开心 / 307
我的 20 年旅游生活·····	李 悦 / 310

改革思辨录

农村改革的创新与突破·····	郭书田 / 317
——纪念中国农村体制改革 30 周年	
物权法的意义和阴影·····	江 平 / 327
跋 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 332



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杨继绳/文

那个年代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还有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

在即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的起因，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并展望其未来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名当年的新闻记者，我曾经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也在不断的记录和思考中，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意义。

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之弊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20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时至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的1976年，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2093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和张

思骞所著《1980年的中国农业》的数字，1980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5.4万个；参加人民公社的有1.7亿户，8亿人口，3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值中，《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据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1%，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没有私营工业。1978年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90.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4%，个体商业只占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2%。1978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20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6%。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达700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40元左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得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

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1982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

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汽中，我走近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 7500 马力，1905 年造；另一台是 6400 马力，1887 年造。

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 4%，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做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 180 万元，但是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 475 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他们从 1965 年就向上级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长达 17 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 3000 多万元。

一架不可能的“大机器”

在农村，由于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地头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1953 年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他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要拿证明文件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 50 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的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比如，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有做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钢产量指标。脱离实际的主观计划必然错误百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

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两弹一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

极度贫困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

1978 年达到 320 公斤——整整徘徊了 22 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1978 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 户人家有 4 户没有大门，3 户没有桌子，68 人中有 40 多人没有棉裤。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史成德，7 个孩子，10 口人，只有 3 只缺口碗。

沈祖润看到的不是个别现象。1978 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做了调查。1979 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 70 元；陇东庆阳第二，为 64.86 元；延安地区第三，为 57.20 元；榆林地区第四，为 52 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 47.60 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 36.80 元。^①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 2 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 年，全国有 2/3 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 1/3 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1980 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们亲眼看到，社员薛登恩家全部家当不值 30 元，他们吃的饭食像猪食一样。最早唱《东方红》的歌手李有源的儿媳对他们说，在 70 年代，生活实在没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讨饭。老乡的生活水平，不如当年李有源最早唱《东方红》的时候。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1977 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 70% 以上是二级

^①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